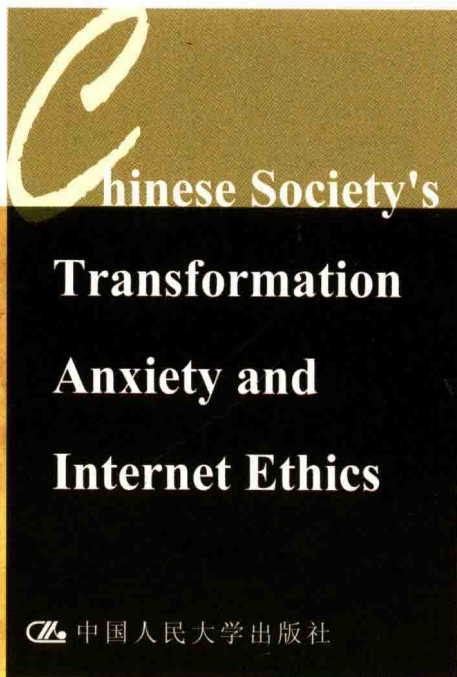




新·闻·传·播·学·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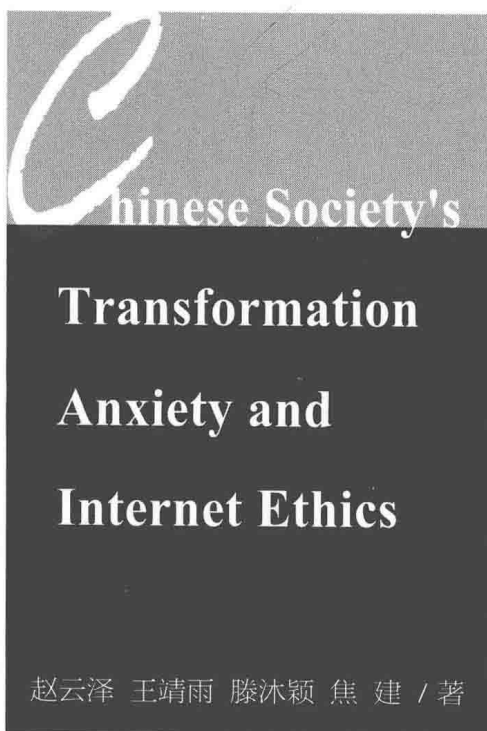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转型焦虑与 互联网伦理

赵云泽 王靖雨 滕沐颖 焦建 / 著



新·闻·传·播·学·文·库

中国社会转型焦虑与 互联网伦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社会转型焦虑与互联网伦理/赵云泽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10
(新闻传播学文库)

ISBN 978-7-300-23592-9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社会转型期-焦虑-研究-中国 ②互联网络-伦理学-研究-中国 IV. ①B846 ②B82-0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7849 号

新闻传播学文库

中国社会转型焦虑与互联网伦理

赵云泽 王靖雨 滕沐颖 焦建 著

Zhongguo Shehui Zhuanxing Jiaolü yu Hulianwang Lunl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mm×240mm 16 开本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10 插页 2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0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自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新闻传播学擢升为一级学科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突飞猛进，这也对教学、科研以及学术著作出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继 1999 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21 世纪新闻传播学系列教材”之后，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华夏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华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纷纷推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教材和国外新闻传播学大师经典名著汉译本。但标志本学科学术水平、体现国内最新科研成果的专著尚不多见。

同一时期，中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有了长足进展。新闻传播学专业点从 1994 年的 66 个猛增到 2001 年的 232 个。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专科在读人数已达 5 万名之多。新闻传播学学位教育也有新的增长。目前全国设有博士授予点 8 个，硕士授予点 40 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等一批研究型院系正在崛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新闻传播学教育以高起点、多专业为特色，揭开了这两所百年名校蓬勃发展的新的一页。

中国传媒大学以令人刮目相看的新水平，跻身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名校之列。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以新获得博士授予点为契机所展开的一系列办学、科研大手笔，正在展示其特有的风采与魅力。学界和社会都企盼这些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第一梯队”奉献推动学科建设的新著作和新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以互联网为突破口的传播新媒体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手共进，以及亿万国人参与大众传播能动性的不断强化，中国的新闻传媒事业有了全方位的跳跃式的大发展。人民群众对大众传媒的使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广泛、及时、须臾不可或缺，人们难以逃脱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新闻传播学大众化社会教育，已经刻不容缓地提到全社会，尤其是新闻传播教育者面前。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传播学著作，已经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的一项迫切任务。

这一切都表明，出版一套满足学科建设、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和社会教育需求的高水平新闻传播学学术著作，是当前一项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工作。“新闻传播学文库”的问世，便是学者们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

“新闻传播学文库”希望对于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有一些新的突破：探讨学科新体系，论证学术新观点，寻找研究新方法，使用论述新话语，摸索论文新写法。一句话，同原有的新闻学或传播学成果相比，应该有一点创新，说一些新话，文库的作品应该焕发出一点创新意识。

创新首先体现在对旧体系、旧观念和旧事物的扬弃。这种扬弃之所以必要，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之所以拥有理论创新的权利，就在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弃旧扬新是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一位俄国作家回忆他同恩格斯的一次谈话时说，恩格斯希望俄国人——不仅仅是俄国人——不要去生搬硬套马克思和他的话，而要根据自

己的情况，像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中国与外国不同，旧中国与新中国不同，新中国前30年与后20年不同，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当前中国的新闻传播学，自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不同于旧中国、不同于前30年的方法与结论。因此，“新闻传播学文库”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要求是：把握时代特征，适应时代要求，紧跟时代步伐，站在时代前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理论魄力，深入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期中去，深入党、政府、传媒与阅听人的复杂的传受关系中去，研究新问题，寻找新方法，获取新知识，发现新观点，论证新结论。这是本文库的宗旨，也是对作者的企盼。我们期待文库的每一部作品，每一位作者，都能有助于把读者引领到新闻传播学学术殿堂，向读者展开一片新的学术天地。

创新必然会有风险。创新意识与风险意识是共生一处的。创新就是做前人未做之事，说前人未说之语，或者是推翻前人已做之事，改正前人已说之语。这种对旧事物旧体系旧观念的否定，对传统习惯势力和陈腐学说的挑战，对曾经被多少人诵读过多少年的旧观点旧话语的批驳，必然会招致旧事物和旧势力的压制和打击。因此，执著于理论创新的学人们，又必须时时唤醒自己的风险意识。再说，当今的社会进步这么迅猛，新闻传媒事业发展这么飞速，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显得相对迟缓和相对落后。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学文库”作者和作品的一些新观点新见解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有时难以得到鉴证，即便一些正确的新观点新见解要成为社会和学人的共识，也有待实践和时间。因此，张扬创新意识的同时，作者必须具备同样强烈的风险意识。我们呼吁社会与学人对文库作者及其作品给予最多的宽容与厚爱。这里并不排斥而是真诚欢迎对作品的批评，因为严厉而负责的批评，正是对作者及其作品的厚爱。

当然，“新闻传播学文库”有责任要求作者提供自己潜心钻研、深入探讨、精心撰写、有一定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这些作品或者是对新闻传播

学学术新领域的拓展，或者是对某些旧体系旧观念的廓清，或者是向新闻传媒主管机构建言的论证，或者是作者运用中国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对海外新闻传播学著作的新的解读。总之，文库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而且必须是新闻传播学学术研究中的精品。这套文库的编辑出版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每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校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中精选三至五种，三至四年之后，也可洋洋大观，可以昂然耸立于新闻传播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成果之林。

新世纪刚刚翻去第一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全组织，推出这套文库。对于出版社的这种战略眼光和作者们齐心协力的精神，我表示敬佩和感谢。我期望同大家一起努力，把这套文库的工作做得越来越好。

以上絮言，是为序。

童兵

前 言

互联网时代我们探讨“伦理”很老套吗？

“这个时代被电脑统计数据所奴役的状况，并非是一种文明进程的倒退，它更像是人类在发展的进程中走入了一条岔道：我们得到了太多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并没有带领我们前进，而是走入了一条曲折不明的小路，需要花费很多精力才能回到正路上来。”^①

1994年4月，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开启了互联网时代。作为一种新技术，互联网被寄予厚望，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描绘着一个人网共生的美丽新世界，曼纽尔·卡斯特则野心勃勃地为网络社会命名，他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断言，网络改变着社会的物质基础，改变时间、空间，改变社会形态。但技术的改变并不总是乐观的，技术是机会，同时也暗含风险，比如丧失伦理的风险。

伦理是基于人们对于文明的渴望而建立起来的规则；

^① [德] 弗兰克·施尔玛赫：《网络至死》，29页，北京，龙门书局，2011。

无伦理之初，人们称其为蛮荒。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无数个体聚合成群体，分享知识并促进协作、共建文明。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发言方式，网络的虚拟性使人人发声成为可能，信息的易得则使原本分散的人群能够在网络空间中迅速聚合，形成强大的影响力，深刻地改变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伦理关系。

亚里士多德说：“一些人懂得一部分，一些人懂得另一部分，而所有人在一起就懂得一切。”受知识和推理能力的限制，每个人拥有的有用知识都是有限而分散的，人类生存离不开知识的共享，在这一过程中，协商必不可少。协商，即群体内的成员交流信息和意见，在讨论中激发思考和创造力，最终产生一个公认较好的结果。

公众讨论一定能促使结果优化吗？桑斯坦的态度并不乐观，在《信息乌托邦》一书中，他概括了群体协商的四大问题——协商放大了群体成员的错误；群体没能充分地获取其成员所拥有的信息；协商遭遇了串联效应（cascade effects），制造了盲人指路的情况；最后，协商群体显示出了群体极化的趋势，使群体走向极端。造成协商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信息，二是社会影响。前者指信息的力量取决于发出信息信号的人的数量和质量。权威人物提供的信息更受重视；非权威人物提供的信息只有在人数上占优势时才能产生强势效果，除此情况外，个人并不愿意说出自己所知。后者主要指信息压力，如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所指出的，很多时候人们保持缄默，不一定是认为自己错了，而是担心观点不一致可能带来的孤立的惩罚。

协商的弊端并未因互联网的到来自动消解。尽管网络每时每刻都在激发众人的协同生产，并在聚合信息的同时做到空前的准确，但是，互联网的使用者是人，人固有的心理机制不会因工具的革新而轻易改变。比如，桑斯坦说：“奇怪而真实的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些你已经知道的事情，结果你往往会更喜欢那个人，对自己更满意。”人们更愿意倾听与自己相契合

的观点，更愿意自己的发言得到尊重和认同。这一特点在网络空间中被放大，使用社交媒体的人群拥有选择信息的空前自由，他可以关注、选择、传播自己所喜好的信息，并将自己不感兴趣以及厌恶的信息彻底排斥在外。

网络让群体聚集和协商变得容易，而哈贝马斯设想的“公共领域”离我们依然遥远。网络言论看似热闹而民主，但更多是强化了众人对观点的自信，未必真能对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有所助益。同时，群体讨论会促使多样化的观点向少数集中，导致观点趋同而非多元。相当一部分持相似想法的人聚集到特定的空间，并制造偏激、极端主义、过度自信，桑斯坦称之为回音室（echo chamber）。

不久前，著名影星周星驰成为网络话题人物。起因是一篇文章《为什么那么多人黑周星驰》在微博上被广泛转载，其文影射中国星主席向华强涉黑，引起了向华强的太太陈岚对周的“炮轰”，一时间众人围观。随后一篇《一个细节掀开了周星驰涉嫌误导、愚弄、操纵粉丝舆论的内幕》再次在微博热传，网民纷纷站队，一方“挺周”，一方“倒周”，此事沸沸扬扬地持续了多日，最终不了了之。

一个娱乐圈明星的私人事件为何演化成社交媒体公共议题？网民围观性的讨论并非一定要追究是非对错，更多是一种态度和立场的表达，个人沉醉于想象的群体之力中，事实变得无足轻重。从几年前轰轰烈烈的“方韩之争”，到“郭美美事件”，再到今日的“挺周”“倒周”，类似事件在互联网江湖上层出不穷，每次都能吸聚网民大量而持续的注意、参与，言论的能量不论正负，都必然对当事人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

在互联网兴起之初，网民的特征是虚拟和匿名，人们可以在网络上扮演任何与现实中完全不同的角色，即“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但随着社交网络日益渗透到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实和虚拟的边界日益模糊，网络暴力给当事人带来的痛苦是不可能挽回的。今日，我们强调个人言论的自由，却无形中把自由的真正含义窄化了。自由包含积极的自由，也包含

消极的自由，前者是“我有……的自由”，后者是“他人不干涉……的自由”。我们过分强调自己积极的自由，结果却伤害了他人的自由。胡适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句话应成为互联网伦理中尤为重要的一条。

互联网并不一定使我们更民主。《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量》作者克莱·舍基乐观地认为人人时代已经崛起，众人的协同合作不是基于利益的，也不受制于组织的安排，而是一种基于爱和分享的自发行动。他对于“人人时代”的描述，更多是一种美好的想象，在达成的过程中，还需要人们若干次对互联网这种新事物进行审视、对人们利用行为进行改进与克制，以促进共识的达成、规则的建立。

以舍基对于未来蓝图的描绘为目标，我们至少需要知晓互联网激发出的人们的哪些精神是弥足珍贵的，不能因为我们的思想陈旧、目光狭隘而将之扼杀；我们也需要明白哪些行为将会给我们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带来伤害，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并明确地指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我们能将喧嚣于互联网之上的尘埃拂去，或许“未来是湿的”终将实现，但这需要我们真正地建立共识，并凝聚成所谓的“伦理”。

目 录

第一章 转型期的中国与互联网上的焦虑情绪	1
第一节 转型期的中国遭遇互联网	2
一、网络使用中的个体焦虑	6
二、网络使用中的群体焦虑	8
三、中国网络社会中的集体认同焦虑	17
第二节 焦虑的社会传递及后果	18
一、焦虑的个体感知	21
二、焦虑的社会传递及后果	27
第三节 网络媒体对社会裂痕的加深及弥合	30
一、网络媒体对社会裂痕的加深	31
二、媒介融合的背景下社会裂痕的弥合	33
三、信任危机之下达成共识的困难	36
第二章 互联网带来的认知革命	39
第一节 一个崛起的网络社会	40
一、信息技术革命	41

二、自由的流动空间	43
三、认同的力量	45
四、参与规则与网络精神	47
第二节 互联网带给我们什么	49
一、交流革命正在发生	49
二、互联网拓展后的精神领地	52
三、社会能量的积累与爆发	54
第三节 认知盈余与万物皆媒	56
第三章 亟须建构的互联网伦理	60
第一节 互联网伦理的指向	62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的“正义”	64
一、作为公平的正义	64
二、程序正义的选择	66
三、互联网是平的吗?	68
四、“人肉搜索”是否在维护正义?	82
第三节 互联网上的道德原点	87
一、互联网伦理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87
二、互联网上的道德原点	90
第四节 互联网与协商伦理	95
一、网络赋权	97
二、网络协商	99
三、网络围观	102
四、网络民主	105
第四章 互联网公共性中的政府、民众与媒介	108
第一节 互联网赋权予民	108
一、互联网的误读	109
二、群体极化与群体冲突	112
三、多数人的暴政	115

四、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	117
五、网民自治	119
第二节 政府角色的进与退	121
一、如何应对批评之声	121
二、流言与谣言	122
第三节 嬗变中的网络媒介形态与探索中的治理	126
一、嬗变中的网络媒介形态	127
二、互联网的可规制性	129
三、互联网的多方共治	131
参考文献	135
后记	146

第一章

转型期的中国与互联网上的焦虑情绪

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产生不稳定”^①。传统中国是以小农经济和宗法制为基础的封建农业国，这种高度稳定的社会结构自战国肇始，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国期间社会结构虽产生激烈变化，但以农业手工劳动为主的落后生产方式到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才下降，人口大规模地向工业区和城镇迁移。工业化、经济体制转型、全球化等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瓦解了数千年来不变的规则和秩序。整个社会的人员、资源开始在横向的区域、纵向的阶层间加速流动，“随意、混乱、不确定”代替了“寻常、普遍、合理”。“农业社会稳定的社会结构提供给人们的安全感和生活的延续性已不复存在，变化和不确定是这一时代人们生活的主题。”^②与此同时，这种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夹杂着国家计划与市场经济、国家统辖与社会自治、组织利益与个体利益等方面的剧烈冲突。哈贝马斯认为：“危机来临，是指寻常、普遍、合理的状态瓦解了，随意、混乱、不确定性和漂浮压倒了以往的规则和秩序。在这一情况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34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② 陈立辉：《互联网与社会组织模式重塑：一场正在进行的深刻社会变迁》，载《社会学研究》，1998（6）。

下，事物一反常态，顺理成章的行动不再带来习以为常的结果，事件变糟了、始料不及、茫然失措，这几乎是所有人一生的普遍感受，也是每一个时代、族群及其文明于发展中必然的伴随产物。”^①而当下中国，正当其时。

第一节 转型期的中国遭遇互联网

现代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衡量标准。而现代性强调个体独立以及社会层面上的自由、民主、法制，是一个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规范和价值属于上层建筑，具有惰性，往往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当下中国，国民经济总量连年增速高于百分之六，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相较于社会文化的变迁，市场结构和社会经济水平变化过快。中国的文化传统较少强调个体的独立和社会的民主。整个社会的重心落在加速实现现代化、建设完善的现代工农业体系上。现代性精神的建设，包括政治上建设民主、法治国家，文化上普及民主科学等过程，与现代化的速度存在巨大落差。这种现代性的滞后，降低了整个社会和个体成员应对现代化风险的能力。

经济全球化进程，将中国经济带入全球性经济的周期循环中，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始终处于起伏与调整状态，2012年后，中国经济更是一直处在下行的风险中。曾被高速增长掩盖的社会矛盾不断暴露出来。房价与工资的巨大差距、资源富集阶层与资源贫瘠阶层的矛盾，成为这种变动、冲突爆发的焦点。

当代中国的社会焦虑，处于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的综合作用下。网络作为一种媒介，其使用本身就对个体情绪存在一定影响。有研究者发现，个体对互联网沟通功能的使用，可能来自个体现实的社交焦虑，虚拟社交

^① 李彪：《舆情：山雨欲来——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41页，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

有利于减轻焦虑情绪，但也可能进一步加重社会孤立；个体对于互联网非沟通功能的使用，可能增加使用者的抑郁、焦虑情绪。另外，个体的互联网使用时间也与个体的消极情绪存在相关关系，互联网使用时间越长，越可能使个体感到浪费时间，从而产生内疚、焦虑等情绪。^①

微博、微信和移动终端普及后，个人媒介使用成本、门槛大大降低。社会话语权部分下放，为普通民众所掌握。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分歧频频发生。2014年2月，央视暗访东莞色情服务业的新闻一出，立即在微博上引起舆论高潮，以往被用于灾难性事件的“挺住”“不哭”等正能量词汇，被反向使用为“东莞挺住”“今晚我们都是东莞人”。传统媒介时代，官方机构利用道德批判树立自己的权威，并制造社会共识。官方媒体的社会议题引导，呈现的是一种“官方媒体报道事件—官方媒体报道群众反应”的模式。但在“人人都是传声筒”的微时代，官方及官方媒体垄断社会话语权的情况已经不复返。官方媒体感到对社会议题引导力不从心，在设置议题之后，不再拥有报道“群众反应”的镜像功能，群众的反应情况直接由其本人呈现在社交媒体上。“官方媒体报道事件—社交媒体内掀起舆论反应—官民意见分歧—官方媒体用道德标准评判民间观点”已成为常见的社会意见流动模式。

同时，个体的情绪感知和情境密不可分，默顿的紧张理论认为，社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人的个体感知。“社会结构紧张”是指不协调的社会结构能够造成此社会中不同个体间的关系、不同群体间的关系都处在一种矛盾的、对立的状态。社会的各种关系都处在一种强大的张力之中。社会矛盾会在这种张力特定的作用点发生激化，从而导致社会危机或其他社会问题的发生。当下中国，社会整体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渴望经

^① 参见吴文汐：《媒介使用对于日常生活时间的重构及其心理影响——基于媒介接触数据的深度挖掘》，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